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学案·学统·学风

夏中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学案·学统·学风

夏中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案·学统·学风/夏中义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徐俊西, 王纪人主编)

ISBN 978-7-5321-4152-4

I. ①学… II. ①夏… III. ①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9042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周志武

学案学统·学风

夏中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242,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52-4/I · 3202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0512-65637737

主 编

徐俊西 王纪人

.....

统 筹

臧建民 杨斌华

项 静（助理）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总序

“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持出版的,编选了15位文学批评家在新世纪头十年中撰写并发表的有关文章。

在文学的鼎盛时代,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没有文学批评,文学的发展肯定是不完善的。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对于读者而言,好的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联系作家作品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如艾略特所说的,起着纠正读者鉴赏力的作用。

上海的文学批评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学生产力的解放,出现了井喷的局面,从中涌现了一批活跃于文学新潮前沿的批评家,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有一部分批评家赋闲或转向其他领域,但大部分仍然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从事批评活动,并对当代文学仍予以较多关注。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批评家脱颖而出,走进了作家和读者的视线,为中国的文学批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本辑的批评家多半来自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不同专业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现身于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界,与当下的文学保持着紧密或较紧密的联系。从他们的自选集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不同的研究领域、知识背景和批评取向呈现的差异。纵览全体,则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文化批评与文本批评兼而有之,并涉及文学思潮和众多的文艺现象;分而观之,则于理论、文学史或学术史各有侧重,在中西文论的交汇中寻找剖析文学或

文化现象的理论支点。在这些批评文集中极少空谈套话,大多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颇能切中对象的特点或时弊,许多论文不乏真知灼见,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和原创性。

由于娱乐至上和快餐文化泛滥等原因,文学的边缘化商业化仍在继续,相应地,文学批评也不很景气,严肃的文学批评领地正日趋萎缩。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肯定文学批评家们对批评的努力和对批评价值标准的坚守,展示批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以集群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新世纪批评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书系,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更多批评家的著作能够纳入这套书系。

2011年3月1日

目 录

王元化“思想—学术”襟怀解读	1
论青年王元化的价值根基及其建构	
——兼及《脚印》、《文艺漫谈》和《向着真实》的深度解读	61
鲁迅与王元化第一次“反思”	87
鲁迅与王元化第三次“反思”	105
论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	
——以 1948 年为转折点	131
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	
——兼及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	161
释陶渊明：从陈寅恪到朱光潜	
——兼及朱光潜在民国时期的人格角色变奏	210
百年中国人文学统三个人物	
——从王国维、王瑶到王元化	244
“百年学案”：学风、方法与气度	260
思想先知 学术后觉	
——新潮 20 年备忘录	272
学术自由的内在向度	
——兼论“学术文化软着陆”	288
后记	295

王元化“思想—学术”襟怀解读

一 引 子

不是所有人都能跻身历史。

人进入历史有两种方式：要么身后名垂青史，要么活着便融入历史。王元化无疑属于后者。若想系统论述王元化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关系，那是应该写一部大书的。本文旨在解读王元化“思想—学术”襟怀。这就亟需从新时期人文学术语境谈起。自1986年王瑶在学界率先萌动“学术史”意识，继而陈平原在1992年发起“学术规范”讨论，极富历史感的李泽厚当会嗅出世风流变，1994年4月他宣告1990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①耐人寻味的是，李泽厚话音刚落，王元化便在同年7月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②不苟同“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因为“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③王元化的话分量不轻。

诚然，王元化是有资格说这番话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他的睿智，更因为他是用长达四十年（1955—1994）的悲情忧患所凝

① 李泽厚：《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香港中文大学。

② 王元化：《清园近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61页，54—55页。

③ 同上。

成的学思历程,亦可说是用半辈子生命体验来作其注脚的。大凡明眼人不难体会,王元化所以对上述“学术—思想”话题敏锐如此,实在是根源于他深邃的襟怀——这便恰巧应验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浮出海面的晶莹冰峰看来所以庄严,是因为水下有更庞大、更厚重的存在支撑它。

说王元化的学思理念是维系其精神存亡的生命线,此语不虚。否则,便很难解释,王元化何以能长期承受1955—1979年的炼狱焚火,死而复生,劫后逢春?亦很难解释,1990年代以来,王元化为何能老而弥坚,仍郁勃反思不已,甚至不惜借精神活体的自我解剖来诊断百年中国思想的症结?末了,恐更难解释,为何愈臻晚景,王元化愈刻骨眷念其童年旧居——清华园?作为思想型学者暨“清华懿弟子”,王元化当年迁出清园(1928)才八岁,为何有如此深挚的“清园情结”,仿佛天地间真有阅尽沧桑的不死鸟,既然它是从清园奋然飞来,于是它命定会向着清园翩然归去?……

或许有人会问:若从1956年研读黑格尔算起,王元化的学思生涯至今已近半世纪,笔者在言及其精神襟怀时,为何注重其1950—1979年的“自启蒙”与1990年代的“再启蒙”,却讳言其1980年代的“新启蒙”呢?这当然不是为尊者讳,而纯粹出于对王元化自述的认同。王元化曾言其“1980年代平反后是工作烦乱”、“心粗气浮”的时代,撰文虽多,满意者少”,^①不足以呈示其精神襟怀,故从略。

二 精神英雄与精神危机

王元化对“思想—学术”关系的价值自觉,最早可追溯到他的“自启蒙”。而要准确还原1956—1979年间的“自启蒙”,就不能不论及他在1955年亲历的“精神危机”。因为“自启蒙”不是别的,本是王元化从“思想—学术”角度对其“精神危机”的化解。

^① 王元化:《清园近思录》,248—249页。

王元化曾回忆“胡风集团”案突然使其“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惶惶不安……”^①此即王元化多年后所概括的“精神危机”。^②

该“精神危机”的实质在于：这是因个体“精神英雄”情结与集权体制的历史性冲撞，导致王元化“价值意向”链的断裂，所突发的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这儿有两个词组很关键：一曰“精神英雄”情结，二曰“价值意向”链。

解读王元化青春期便有的“精神英雄”情结，势必追问“契诃夫”、“罗曼·罗兰”、“别林斯基”对青年元化的感召力。这三位欧洲作家的英名所以加引号，是为了表明在王元化眼中，上述姓氏的意义已不限于日常称谓，而分明已提升为某种表征给定理想人格要素的价值符号。所以说“给定”，此当源自青年王元化对其所心仪的作家的道德文章的深切体悟与由衷感佩。假如说，“契诃夫”是标志圣洁品性对灰色庸众的天才警觉，“罗曼·罗兰”是隐喻坚韧意志在孤独中守望信念，那么，“别林斯基”则是意味着一种甘为真理而献身的殉道者的生存方式。王元化曾特别倾心别林斯基的那段箴言：“难道对智的生活处之淡然的人，能够懂得，一个人可以把真理看得比礼貌更重要，为了爱真理，情愿受到敌视与迫害吗？”^③正是这一“精神英雄”的崇高造型，激励着青年王元化“只要想到他，就会赶走犹豫，驱除柔弱，勇气从心里升上来。”^④

耸立在青年王元化心头的那尊“精神英雄”铜像，若须命名，没有比“向着真实”四字更精准了。有人说这四字足以概括王元化平

① 王元化：《莎剧解读（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4页。

② 同上。

③ 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325页。

④ 王元化：《思辨随笔》，324页。

素的“生活原则”，^①诚然，这也是王元化195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的书名。

“真实”在青年王元化笔下蕴藉多重涵义，它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更指涉人生价值观。若着眼于哲学，则“真实不仅是发生过的，而且包括可能发生的；是现实，而不仅是存在”，或曰“真实不仅存在于物质世界，而且，还包括精神世界的种种现象。它并不把人们头脑中出现的想象、幻想以致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意象与意念摒弃在外”，故若落实到美学，则艺术“真实”既“可以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也可以用象征以至荒诞的手法表现”；亦即“真实既是审美客体的属性，也是审美主体的属性。后者就是许多作家一再说到的作家的真诚，说真话等。这也就是说作家应当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写自己感受到的和体会的东西，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去作违心之论，去撒谎”^②——显然，“真实”至此已演绎成一个价值论命题了。

接着再来体味“向着”。“向着”作为动词，似呈“仰望”状，是对内心神往的精神境界的屏息瞻仰，同时也可读作是在价值殿堂作庄严的自我承诺，须按自己所信奉的箴言去生存，直道而行。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这将意味着，须像契诃夫那样能拒绝庸俗——高尔基曾这样论述契诃夫：“庸俗是他的仇敌；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霉臭，就是在那些第一眼看来好像是很舒服，并且甚至光辉灿烂的地方，他也能够找出那霉臭来”^③——诚然，青年王元化也明白，契诃夫所以能对坊间流俗持有警觉，是因为他“对人生有高的要求”，“而且也只能由那种想看见人成为单纯、美丽、和谐的热烈的愿望产生。”^④契诃夫的魅力还在于，他能让王元化“觉得接近”：“不仅是由于他在作品里所表现的俄国社会和我们的社会有着类似之处，而且

① 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75页。

② 同上。

③ 王元化：《思辨随笔》，348—349页。

④ 同上，349页。

也是由于他在作品中显示出来的对生活的‘高度看法’；用这看法‘照亮了它的倦态，它的愚蠢，它的挣扎，它整个的混乱……’”^①

其次，这也意味着，须像罗曼·罗兰那样不惧卑微、孤独、寂寞地去拥抱信念，哪怕包围他的全是敌意的目光，哪怕整个世界都在诅咒他的陷落，他也要像铜像般刚毅，默默地走自己的路，哪怕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成功，是信仰！”^②也因此，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成了青年王元化的人生教科书，以致爱不释手，其阅读过程屡屡幻化为追随小说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同他一起去翻越崎岖的、艰苦的人生的山脉，我把他当作像普罗米修斯从天空窃取了火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一样的神明。”^③青年王元化读懂了小说家是想通过克利斯朵夫造型来辐射“他所珍视的人格力量”，因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格”——就像“思想不能借来，思想必须变成自己的血肉要求，必须化为自己的实践意志”一样，伟大人格也“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它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形成的战斗要求”，故它才可能承担“血淋淋战斗的考验……”^④“我们来到这世上，为的是发挥光辉”；“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⑤王元化当年所以如此反复、回旋曲式地辑录罗曼·罗兰名言，实是因为克利斯朵夫刻在他心头的印记太深，太深。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在“使英雄再生”之后，^⑥又将“精神英雄”的种子植入了王元化的青春心田。那年（1941），王元化二十一岁。

“精神英雄”情结作为人生预言，其实已经暗示王元化的命运之旅难免峻险。因为他将展示为某种迥异于本土语境，颇具“挑战性”的独特价值理念及其活法。用别林斯基的精神传人车尔尼雪夫

① 王元化：《思辨随笔》，350页。

② 同上，329页。

③ 同上，352页。

④ 同上，330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328页。

斯基的话说,便是他所以会遭受流放、苦役与凌辱,是因为其“脑袋与宪兵长官苏伐洛夫的脑袋构造不同……”^①

“向着真实”为内核的“精神英雄”情结,作为“人格自期”本是为了自我激励,但在热情入世的青年王元化身上,又不免推演出某种别致的社会—政治意念。王元化在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曾撰《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将其“新启蒙”归结为“民主的爱国主义”与“反独裁的自由主义”,^②便足见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创见。因为在抗战语境,如此明确地让“民主”与“爱国主义”互渗,让“反独裁”与“自由主义”交响,这不可能出自对权威文件的盲目复述,而纯属独立思考所致。

耐人寻味的是,独立、自由地“向着真实”,当是王元化尽情吮吮19世纪西方文学蕴含的近代人道主义后的心灵结晶,但作为西方文学之精神母体的基督教思想,无意中通过家庭教育,在无声地浸润且强化青年王元化的人格独立。王元化说:“基督教给我们的好处,是人应该谦虚,人不可以如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没有什么对人的崇拜,对鲁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会,我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在原地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③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不无例外的谦卑,可推导出世俗人际层面的人格平等,而一个人若切身体验到平等人格之尊严,且将此当真,则他肯定有“独立精神”,是可以做到既不媚俗,也不逢迎权势的。

大凡“独立精神”者便很难不“自由思想”,这大概是惯性使然,青年王元化也不出此律。比如在1940年便敏感日本藏原惟人、苏联拉普派文论有机械论之嫌的王元化,当他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

① 王元化:《思辨随笔》,327页。

② 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44页。

③ 同上,29页。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存疑时,就在党内学习会上直抒己见。什么叫耿直?“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放弃自己所确认的”,^①此即谓耿直。否则王元化也就不成其为“王元化”。有意思的是,当年沪上的地下中共文委领导如孙冶方、顾准等也颇具“大将风度”,竟能兄长般地宽恕“无忌童言”。这已是当年延安语境看不见的气象了。这对青年王元化的政治境遇来说,当是好事;但就王元化的精神成熟而言,则难说。

因为这将诱发王元化的价值错觉:即把“精神英雄”情结与其奋勇投入的现实政治认作同等“真实”的神圣,而不探询彼此间是否埋着一条异质界限。假如说旨在“人格自期”的“精神英雄”情结纯属青年王元化的个体心灵事件,应归于人类的普世价值谱系,它是超国界、超党派的;那么,现实政治所演绎的理念及其规则则受制于给定党派的意志、谋略与利益,它不可能超历史、超功利。但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又怎么可能在救亡浪潮扑面而来时,返身体认自己清醒与否呢?这太苛求了。这就像王元化在1940年初与满涛在裕和坊纵论西方文学,从探讨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到争辩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孰优孰劣时,他又怎会知晓数年后,他所钟情的19世纪欧洲文学将被黄土窑洞指责为必须割舍的“小鲁艺”,而只有扭秧歌与“信天游”为品牌的“大鲁艺”才是“革命”的呢?事实上,当王元化英姿勃发地加盟“民族解放先锋队”,继而加入共产党时,他还只是读中学的年龄,实是出于青少年特有的“纯洁的道德感”,不忍心“人间存在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不公正”,^②才毅然从政。有人说对了:当年“他只是受了一直在知识界、思想界流行的民主自由等口号鼓动,他只有一份简单的理想化的革命信仰。他本质上不过还是一书生与热血青年而已”。^③于是他也就难免将其“精神英雄”情结,与其所投入、所想象的宏大场景相耦

① 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45页。

② 同上,33页。

③ 同上,83页。

合,而虚拟成笔者所说的,内在于王元化心灵的“价值意向”链。

所谓“虚拟”,是说当青年王元化在内心将两种异质价值意向链接时,他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他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两者的功能性耦合,将使其生命放出光辉,不仅美好,而且踏实。假如说“精神英雄”情结犹如理想天国,那么,政治活动便是其理想的人间践履;若转换成红色术语,也可说这两者关系仿佛是“革命理论”与“革命活动”的关系——否则,便很难体会,这位年轻党员何以在1945年如此无保留地赞叹克利斯朵夫对他的精神感召:

这种英雄的心使我得到多少鼓舞啊!那时,上海正统治在敌人手掌下,戒严、封锁、屈辱、思想的压迫使多少人陷入极端的沮丧中。可是当我认识了克利斯朵夫的艰苦经历之后,我看到他处于这样不幸的境遇中仍是毫不动摇地奔赴他的途程,始终不放松他的远大的理想,什么都不能阻挠他的果敢的毅力。“在这种榜样之前,谁还有抱怨的权利?”……^①

一位中共党员所以能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其精神支柱居然是西方小说家所虚构的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你可以因此说,王元化思想上还未入党;或曰,这表明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迫在眉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入侵战斗的先锋队,王元化的灵魂深处委实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不妨与艾思奇作一比较。艾思奇在1944年撰文悼念邹韬奋说:“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是有一定过程的。他首先必须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各种个人主义因素,然后用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对此,王元化晚年颇为感慨:“延安于1942年开始整风,两年后艾思奇就有这种认识,说明他学毛泽东思想学得很好。”^②言

^① 王元化:《思辨随笔》,352页。

^②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19页。

下之意,王元化自愧不如。故你又可说,王元化与其说1938年后已是先锋队成员,毋宁说他只是党的同路人。也因此王元化以及像他那样“不懂得趋承上意那些政治陋习,只知唯真理是从”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无一幸免”。^①

毛病出在王元化太真诚,太执著于“向着真实”。人家是“船到桥头自会直”,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灵活多变,故如鱼得水;王元化是“一篙子插到底”,宁折不弯,不识时务近迁,故成不了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之俊杰。真诚使王元化赢得爱情玫瑰,真诚也使王元化长年走不出体制迷宫,屡屡碰壁不已。这位1949年前很想当“精神英雄”的才子,一俟涉足共和国舞台,迟早将出演悲剧角色。其实早在“胡风集团”案发前,王元化已经遭遇尴尬。1951年王元化进华东局宣传部不久,便受命“不得不去批评那位他并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他无法说出一字,只有——‘哇’一声哭了出来。这时的泪水,那个时代的泪水,如果用历史的试纸来量,它会是什么颜色?”^②……

1955年王元化陷于“胡风集团”案而不自拔,毛病依旧在他太真诚,太拘泥于“独立想法和做人原则”。^③人家是“吃一堑,长一智”;王元化是“宁肯玉碎,不愿瓦全”,靠出卖良知与友人来换取苟活,告密者的这套把戏,王元化太陌生,学不会,也不屑学会。有人说张中晓是极端反革命,他说张中晓是纯朴青年;有人说胡风非粉碎不可,他说不能因为胡风文艺观不同于周扬就算反动;有人说只要承认胡风组织反革命集团,就放你出去,他硬不说,以致公安局长看不懂他的“顽固”。^④若转换视角,“顽固”又堪称是对王元化在厄运前不辱身、不降志,不因人生危难而昧心的另类“人格鉴定”。

①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319页。

② 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71页。

③ 同上,83页。

④ 同上。

然而,这毕竟是一场不对称的“对话”或对峙:一边是权威的声音,这声音的背后站着体制,该体制还披着烽火硝烟,是暴风雨所诞生、所奠定的,其光荣、其伟大“无可置疑”;另一边则是心理上不设防,兀地被剥夺自由,被裹在孤寒中的文弱书生……“平日里本是漫不经心自觉无足轻重的一些事,在审查中一再的追问下都变成了重大关节,而连自己也觉得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反复的思考,重新的认识,灵魂处在这样的煎熬之中”^①……这还不算最致命的。

最致命的在于:王元化顷刻痛感平素令其心安理得乃至意气风发的心灵根基——此即笔者所说的“价值意向”链——业已断裂,被摇撼,有被掏空之危!……我说过,王元化的“价值意向”链本是由他的“精神英雄”情结与现实政治取向在想象中耦合而成的。两种骨子里不一的价值参考系,犹如一是泥土,一是沙粒,前者柔软,后者坚硬,性本迥异,很难捏到一块,但兼具柔肠铁肩的王元化又委实很想用青春热血将两者搅拌成混凝土,为其精神支柱奠基。谁知本土语境风云翻卷,三九骤寒,原先掺入水泥的沙粒因大气候剧变而顿显僵硬,它不仅不屑与泥土为伍,相反,它彻底得多,还要否决对方存在的理由,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方显其立场坚定……

以“价值意向”链解体为中心的“精神危机”对王元化的灵魂轰毁是双重性的:一是原先用血肉浇灌的“精神英雄”情结而今已遭体制放逐;二是原先同样用血肉来践履的现实政治取向却转眼变得粗粝乃至粗暴。其指令,其呵斥,虽咄咄逼人,却终因其虚假与虚妄,难以使人诚服。这恰似青年王国维曾体验过的心灵苦闷:“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过王国维是在学业领域,而王元化则是在政治—人生领域,故后者苦闷更大,濒临绝望。刘小枫曾这么论述“绝望”：“绝望”作为一种极端的情感形式,其特点是“很难说究竟是价值或意义真实抛弃了诗人,还是诗人抛弃了价值或意义的

^① 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83页。